

红楼梦评论选刊

(一)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七四年一月

《红楼梦》评论选刊(一)

目 录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1)
鲁迅论《红楼梦》·····	(4)
《红楼梦》前言·····	李希凡(11)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孙文光(59)
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	钟平(71)
评《红楼梦》·····	徐辑熙(85)
《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 ·····	陈熙中 胡经之 侯忠义(106)
《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史 ·····	宗文 洪平(126)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	袁宏昌(140)
从几十条人命看《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吴幼源(151)
从《红楼梦》反映的封建社会没落史看孔子思想的破产 ·····	俞汝捷 谢琼桓 夏康达(163)
资料	
《红楼梦》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74)
1973年报刊评论《红楼梦》目录索引·····	(186)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 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

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是几乎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

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该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见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鲁迅论《红楼梦》

然荣公府虽显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其（指高鹗）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芬”，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

成干净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

……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人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蓬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蓬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论睁了眼看》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

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阻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蓬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绛洞花主〉小引》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大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距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

《上海文艺之一瞥》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此句是柳湘莲的骂语，见第

六十六回。焦大醉骂宁国府，见第七回。）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言论自由的界限》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草鞋脚〉小引》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扎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象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十四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象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看书琐记》

……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沾，《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

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沾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出关〉的“关”》

《红楼梦》前言

李 希 凡

我国古典小说的著名作品《红楼梦》，最初是在十八世纪中叶（清代乾隆王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传抄、流传，到了十八世纪末，才有高鹗、程伟元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刊行问世。这时距离曹雪芹逝世不过三十年左右，《红楼梦》已风靡全国。在当时士大夫中间，曾经盛传过这样的谚语：“开谈不讲《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这说明了这部小说在清代中叶之后，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近古文学史上，《红楼梦》一向是学者文人们注目的中心，所谓“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这情形从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大体上说，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就穿凿附会的“索隐派红学”占主流地位。他们大搞“索隐”、“扶微”，拚命想从这部小说中寻求所谓“微言大义”，“扶”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统一

战线的破裂，又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新红学派”。他们假借研究《红楼梦》的名义，大肆推销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他们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行反对革命、毒害青年之实。

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狂热鼓吹什么“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以及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的伪“科学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他的《红楼梦考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胡适根据他这种“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进行“小心的求证”，在他的《红楼梦考证》里，分析研究《红楼梦》的结果，得出了这样几条结论：

（一）《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二）《红楼梦》“全书的‘旨义’”是“闺友闺情”“红楼梦十二支曲”、“风月宝鉴”是这部小说的“点睛”之处。

（三）《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猻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

胡适在这里妄图用这种“自传”说完全抹杀《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内容，取消这部小说的暴露

和批判封建制度的历史价值，否定它的艺术典型的概括意义。

然而，实用主义的考据学，是无法掩盖它的唯心论的反动本质的，因为胡适的这种孤立的、狭隘的、离开社会实践的研究方法，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真面目。

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辨》里，对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考证学亦步亦趋。据俞平伯自己讲，在胡适提出这些主张以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等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以后，“于是研究的意兴方才感染到我”。从此，他们就以通信的形式一唱一和地讨论《红楼梦》，以实践他们的主张了。俞平伯一会儿说，《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一会儿又宣称：“《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它的“基本观念是‘色’、‘空’”，“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甚至从所谓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的形式主义的考证出发，推断出薛宝钗、林黛玉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实为一人”，即作者的“意中人”。他把胡适所考证出来的结论加以扩充吹涨，本末倒置地把小说《红楼梦》的内容变成事实考据的对象，又把史实上的曹家和小说中的贾家互相比附，使《红楼梦》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被割裂成从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的偶然的事实碎片，妄图用这种不可知论的“自传说”，把文学青年引进烦琐考证的迷魂阵里去。以便于“无形中，养成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都变成实用主义的信徒。

“新红学派”特别是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假借“整理国故”研究古典小说，大肆贩卖这一套反动资产阶级主观

唯心主义的谬论，其政治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胡适曾毫不掩饰地声明：“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我是“教我的少年朋友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并恶毒地叫嚣：“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因而，他们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狂热鼓吹：“京事一切沉闷，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其毒害青年、涣散斗志的罪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

但是，就是这个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新红学派”，却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统治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全国解放后又同刘少奇、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勾结起来，继续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妄图“顽固地保持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一九五四年五月，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目周扬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大肆美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是有“抱负和理想”、“有良心的、正直的人”，吹捧他们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奴颜婢膝的可耻面目。

正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支持和利用下，俞平伯把他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的《红楼梦辨》稍加改动，易名《红楼梦研究》再次出版，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复散播胡适派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而《文艺报》，却在它的“新书刊介绍”的专栏内，狂热吹捧“《红楼梦研

究》一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

当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任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一直在进行疯狂反扑。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呈现出空前激烈的状态。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就是突出的例证。因而，“新红学派”反动观点的泛滥，只不过是这场激烈斗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反映。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看到了文艺界资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形势。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间，继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动手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毛主席的多次口头指示受到刘少奇的走卒周扬、邓拓一伙的疯狂抵制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发出了向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全面开火的伟大动员令。

毛主席在这一光辉信件中，深刻地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严正地指出，刘少奇、周扬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